

## 關於天主教從十六世紀至十八世紀 在越南傳入與發展之初探

阮友心\*

### 摘要

自十六世紀開始，西方人前來越南貿易，教士團也隨之而來。據史料記載，黎莊宗帝元和元年(1533)，有西方人名依泥樞(Ignetio)者自海上來，在南真縣(今南直縣)以及膠水縣所屬的幾個村莊傳教。從此，教士團繼續到中部如清化，中南部如沱濃傳教。可是至十六世紀末在大越的傳教事業還沒有可觀的進展，要到十七世紀至十八世紀末期，越南傳教事業才越來越發達。

儘管十七世紀末十八世紀初北方和南方的政權陸續進行禁教政策，但教士團仍然的積極活動，所以傳教還是有收穫結果。在傳教過程中，越南政權和傳教士發生了衝突，甚至還導致屠殺。其原因在於：天主教對國人崇拜祖先的傳統信仰有點不重視，以及傳教士越來越直接干涉到越南內部的政治領域。

**關鍵詞：**十七-十八世紀、大越、傳教、禁教、國語

---

\* 越南史學院圖書館館長(歷史學博士): TS. Nguyễn Hữu Tâm, Viện Sử học Việt Nam.

本人的拙作寫好後，蒙幸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許文堂教授評論的一文和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主任鄭永常教授審閱，並得到兩位審查者指出缺陷之處和補充珍貴的建議，趁此，謹向各位同仁表示赤誠的謝意-阮友心敬上

## 關於天主教從十六世紀至十八世紀在越南傳入與發展之初探

阮友心

- 一、 歷史背景
  - 二、 傳教的形成和發展
  - 三、 政權和傳教的衝突原因
  - 四、 結語
- 

### 一、歷史背景

#### (一) 世界背景

從十四、十五世紀起，資本主義已從地中海沿岸的城市如威尼斯、熱那亞、佛羅倫斯等地開始萌芽。商品經濟和資本主義方式的形成、發展，增強了對商貿市場和集中資本的需要。商人和新興的資本階級為積累更多的財富而大力推動殖民遠征。在商業資本佔優勢的早期殖民諸西歐國家如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法國等先後開始了資本原始積累的歷史進程，它們都實行重商主義政策。隨著商業貿易的發展，金屬的貨幣如白銀，特別是黃金得到廣泛使用。所以尋找和奪取黃金成為驅使西方冒險家們冒死遠航追求的目標和動力。<sup>1</sup>正如恩格斯所指出：「黃金是白人剛踏上一個新發現的海岸時所需要的第一件東西。」<sup>2</sup>

十三世紀末馬可波羅（Marco Polo, c. 1254-1324）在《馬可波羅遊記》

---

<sup>1</sup> 梁志明主編，《殖民主義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東南亞卷〉，頁12。

<sup>2</sup>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450頁。

中，關於東南亞地區的最早記載掀起了西方資本家對東南亞財富的覬覦。此後，從十四世紀至十六世紀有許多歐洲傳教士或商人來到東南亞，他們的遊記或回憶錄都生動描述東南亞地區的具體狀況，尤其在著作裡都注重到那個新地區的豐富產物及其香料貿易。從十五世紀起，西方人特別是葡萄牙、西班牙和荷蘭各國開始相繼來東亞佔領殖民地、開設商館、進行貿易。一四八七年，葡萄牙人迪亞士（Bartolomeu Dias, c. 1451-1500）發現好望角；一四九八年，瓦斯科·達·伽馬（Vasco de Gama, c. 1460-1524）繞過非洲好望角到達印度，葡萄牙人迅速進入東方。當葡萄牙人開闢印度洋航路，壟斷東方貿易特權的同時，西班牙人也於一四九二年發現美洲大陸。十六世紀初，西歐資本主義萌芽發展迅速。一五一九年，西班牙王命令麥哲倫（Fernando de Magallanes, 1480-1521）西航進入太平洋，發現呂宋。十四~十六世紀初，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海外探險與殖民侵略活動在世界上佔據了首位。葡萄牙和西班牙兩國的殖民地活動以武力征服為主要的方式。他們從殖民地奪取的許多金銀財富，控制了香料產地，同時還壟斷海上貿易。十六世紀末十七世紀初，葡萄牙，西班牙的殖民勢力衰落，新的殖民勢力如荷蘭、英國、法國逐步發展起來。一六〇〇年英國成立了英國東印度公司(EIC)，接著，一六〇二年荷蘭東印度公司(VOC)出現，一六六四年法國東印度公司成立(CIO)，荷蘭的東印度公司在東南亞的殖民活動起了很大的作用。十六~十八世紀在東南亞各國家，西方殖民地活動主要集中於沿海地區國家並在這些地區建立商館和兵站。<sup>3</sup>

一五一七年，歐洲的宗教改革激發了羅馬天主教的改革，並大力開展普世宣教運動。一五三四年羅耀拉（Ignace de Loyola, 1491-1556）在巴黎創始耶穌會(*Societas Jesu*，越文稱為Đòng Tê)促成天主教對外宣教工作的重要任務，天主教徒熱誠地前往新發現的區域，開闢新的教區，為教會拉攏信徒，同時，彌補宗教改革運動所帶來的損失。所以，傳播天主教的活動範圍要擴大到世界各地。傳教士跟著西方商船遠航到美洲和遠東的新發現地區宣教。其中，東南亞

---

<sup>3</sup> 梁志明主編，《殖民主義史》，頁17-18。

沿海各國成為首要傳教的地區。

## （二）國內情況

### 1.南北朝之亂(1527-1592)

十六~十八世紀是越南（古稱大越）各個封建勢力的內戰時期。從十六世紀初，黎朝局勢發生重大變化。一五二七年莫登庸奪取黎朝的王位，在北方建立莫朝，改元明德。

阮氏起兵助黎朝：在莫登庸篡位之時，黎朝的不少官吏逃避、隱匿，不肯跟莫朝合作。有一位名叫阮淦（Nguyễn Kim）的人擔任清化右衛殿前將軍安靜侯，<sup>4</sup>遁往哀牢（今老撾）。他訪求黎氏子孫，以圖復國。至癸巳年（1532）訪得黎昭宗少子名維寧（Duy Ninh）。十五三三年，阮淦和黎朝舊臣送維寧回到南方，擁立為帝，是黎莊宗（Lê Trang tông），改年號為元和，建朝廷於清化。南方（清化以南）的黎朝逐步佔據，與北方（清化以北）的莫氏相抗衡，形成南北朝時代（1533–1592）的局面。黎朝與莫朝都企圖除掉對方，統一國土。但是在阮淦死後（1545），兵權交與鄭主（那時是鄭檢-Trịnh Kiểm-阮淦之婿）掌管。一五四八年，黎莊宗崩，鄭檢即立太子維暄（Duy Thuyên）為帝，是為黎中宗，改年號順平，在位八年（1548-1556）駕崩。中宗無嗣，其時黎氏之後裔亦絕，兵權全部落於鄭檢手中。鄭檢命人尋訪黎氏遺裔，後來找到黎太祖兄黎除的玄孫名維邦（Duy Bang）迎回立為帝是黎英宗（Lê Anh Tông）在位十六年（1556-1573），改元三次：天祐（1557）、正治（1558-1571）、洪福（1572-1573）。鄭檢卒後，權歸鄭松（Trịnh Tùng - 鄭檢之次子）。鄭松派人追捕英宗，押回弑之。鄭松擁立英宗第五子諱維潭（Duy Đàm）為帝。那年（1573）維潭才滿七歲。這是黎世宗（Lê Thế Tông）在位二十七年（1573-1599），改元兩次：嘉泰（1573-1577），光興（1578-1599）。

---

<sup>4</sup> 阮榜中，《越南開國志傳》，漢喃研究院藏本，A.24/1-2記載：從祖父至阮淦，其祖孫三代均為黎朝之官。

最後，一五九一年，南方的鄭松起兵大舉進攻莫朝的京都升龍Thăng Long（今河內 Hà Nội），並且佔據許多北方地區。這是南北戰爭期間最大的戰鬥。一五九二年，鄭軍包圍升龍，逼得莫朝不得不棄逃。一五九二年末，鄭主軍隊佔領升龍。從此結束了割據的局面，鄭主統一國土。至此莫氏失去了帝位，莫氏稱帝從一五二七年至一五九二年，前後恰為六十五年。日後雖賴明朝袒護得以回居高平之地，但也是一邊陲之地而已。在高平的殘餘莫氏朝廷還延長至一六七七年才被鄭柞大舉消滅。莫敬武和親屬逃避中國龍州地區，被清朝官軍俘獲，押回還給鄭主。

## 2. 鄭阮紛爭及其內戰

鄭主自消滅莫氏，為黎氏恢復天下之後，日益驕橫，擅竊權柄，欺壓君主。可是為了能夠長期掌握政權，鄭松並沒有廢除黎朝後裔的皇位，相反地仍然讓黎氏作皇帝。但是，當時的皇帝是有名無實的，因此實際上的一切事情都由鄭主來決定。這個時期，史稱是黎王鄭主(Vua Lê, Chúa Trịnh)即黎氏為皇，鄭主執政時期。

十六世紀末，鄭主稱霸北方，阮主稱霸南方，是鄭阮紛爭時期。從一六〇〇～一六二七年間，鄭阮兩大封建集團暫時和平共處。阮潢（阮淦之子）被派到順化鎮守，表面上臣服於鄭主，每年都向鄭主繳納白銀和賦稅。可是實際上，阮潢暗地裡準備力量抗衡鄭主。他加速築城建壘，在廣南貯備武器和糧餉。鄭松發現阮潢的陰謀後，一五九三年鄭松留阮潢在北部，但阮潢潛回順化。從那天起，當時的越南領土被封建集團分隔成為兩個部分，稱北方為Đàng Ngoài，南方為Đàng Trong。在十七世紀時，除了鄭主軍隊與莫氏殘軍之間的衝突，阮主與占城、真臘之間的戰爭之外，最大的戰爭就是阮主與鄭主之間的戰爭了。雙方征戰連綿不斷，延續百年之久，在阮鄭兩主所轄地區的交界處經常發生零星的戰役。從一六二七年至一六七二年，鄭阮開始爭奪戰將近半個世紀，其中有七場大戰，雙方兵爭不已，最後，又造成雙方對峙，不分勝負的局

面。戰火綿延使得全國人民需負擔沉重的賦稅、徭役，特別是農民爲了兵役不得不放棄土地，田園荒蕪，沒有收穫，商業停滯，手工業蕭條。雙方的戰爭終於導致十八世紀農民起義，尤其是十八世紀末由阮氏三兄弟帶領的西山農民起義爆發，最終推翻了南方的阮主統治，同時配合北方農民消滅鄭主的勢力，結束對峙。西山起義還擊敗了清朝侵略軍，並且推翻了三百多年統治的黎氏王朝。

## 二、傳教的形成和發展

### （一）十六世紀傳教士來大越開始傳教

十六世紀自有西方人前來貿易，教士團也隨之而來到大越，據越南正史《欽定越史通鑒綱目》記載：黎莊宗元和元年（1533）有西方人名依泥樞(Ignetio)在北部沿海的幾個村莊傳教。依泥樞自海上來，在山南下南真縣寧疆社、群英社（今屬南定省，南直縣）以及膠水縣茶縷社（今膠水縣）進行傳教。<sup>5</sup>最近，據 Đỗ Quang Chính, SJ.的資料：一五二三年有葡萄牙人 Duarte Coelho在中南部的藍島嶼(Cu lao Cham)留下刻在石頭上的十字架。<sup>6</sup>Charles B. Maybon編撰的《在安南國的歐洲人》作品裡寫道：「葡萄牙人是最早來印度洋的。」，不久後，他們就注意到中南半島地區。一五一一年，進攻麻六甲後，d'Albuquerque 派使團來暹羅。一五一六年 Fernand Perez、一五二四年 Duarte Coelho和一五三五年 Antonio Faria do Fernand Mendz Pinto神父被派去考察東洋沿海一些地區。<sup>7</sup>Felippe do Rosario Binh在他的著作裡供給資料：從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去日本進行傳教期間，一五二二年耶穌會教派 Phanxico(Francesco)神父乘

<sup>5</sup> “Khâm định Việt sử thông giám cương mục”欽定越史通鑒綱目，XVI 冊，Nxb.Giáo dục, Hà Nội, 1998, (越文)。

<sup>6</sup> Đỗ Quang Chính, SJ. “Dòng Tên trong xã hội Đại Việt 1615-1773”, tr.10。

<sup>7</sup> Charles B. Maybon: “Những người châu Âu ở nước An Nam”《在安南國的歐洲人》. Nhà xuất bản Thế giới Hà Nội, 2006, tr.122, (越文譯本)。

坐的船在海上發生事故，所以只得「舶入廣地（Đàng Trong）修理」。<sup>8</sup>不幸Phanxico神父於一五五二年去世，那時他剛滿四十六歲，他是開始越過歐洲之地向東亞進行傳教的最早一位耶穌會教士。<sup>9</sup>一五五〇年，道明會（Dominicans）一個神父跟葡萄牙商船從麻六甲來到河仙的芹𤟇港（Cảng Cần Cáo）。<sup>10</sup>但是，各個神父的努力傳教並無太大成效。彼時已然三十年過去，當時越南的史料依舊沒有傳教的記載。直到十六世紀後期的二十年，終於出現了不少記載西方神父在越南各地的傳播腳印。莫茂洽帝延成第四年（1581）Giovani Btisto De Tessro神父得到莫茂洽帝的允許坐商船向Đàng Ngoài進行傳教。莫茂洽帝延成第六年（1583）由Diego de Oropesa神父帶頭的教士團坐一艘船抵達廣安（即廣寧）的港口。陪同的有Baratolome Ruiz神父、Pesto Ortiz神父、Francisco de Montulla神父和在實習時期的四位神父。在一段時間傳教後，可能收不到效果，最終教士團又回歸澳門。<sup>11</sup>根據別的資料記載：莫茂洽帝延成第五年（1582），由Diego de Oropesa神父帶頭的教士團到達北方Đàng Ngoài，得到莫茂洽帝的熱情接待，至一五八五年教團才回去。唯一的傳教結果只是給一個將死的孩子進行終敷禮。<sup>12</sup>一五八六年則有法國神父Georges de Lamotto和葡萄牙神父Lvuisete Fonscon 來廣南地區進行傳教。

一五九一年，鄭松以「扶黎滅莫」的名義向北方Đàng Ngoài的莫朝政權進攻。在鄭主軍隊裡有Alfonso Ducosta神父和Joan Goussalver神父與陪同的Pedro Ordonez de Decevallos神父參加。一五九〇年西班牙人Pedro Ordonez de

---

<sup>8</sup> Felipe do Rosario Binh, “Truyện n’c Anam Đàng Trai”, Chuyện nhĩ, viết tay, Lisboa, 1822, tr.652 Đỗ Quang Chính, SJ. “Đòng Tên trong xã hội Đại Việt 1615-1773”, tr.10.

<sup>9</sup> 同前注，頁10（越文）。

<sup>10</sup> Charles B. Maybon, “Những người châu Âu ở nước An Nam”（原文：Histoire moderne de pay d’annam（1592-1820）（ch.2在安南國的歐洲人），tr.123（越文譯本）。記載「在葡萄牙人佔據麻六甲後，便成立Dominicans教派大教區。1550年這個大教區派舉Gaspard da Cruz到高棉，為最早到高棉的教士。他到河仙港，後續即無從得知。

<sup>11</sup> Phạm Văn Sơn, “Quân dân Việt Nam chống Tây xâm（1847-1945）”，軍史3，參謀總部，西貢，1971年版，頁22（越文）。

<sup>12</sup> 紅藍：在越南的天主教歷史“Lịch sử Đạo Thiên chúa giáo ở Việt Nam”摘引：“Lịch sử chế độ phong kiến Việt Nam,T.3”越南封建制度歷史，第3集，河內，1960，頁397。

Decevallos神父乘坐的商船被颱風颶到大越中部的沿海地區，那位神父在安場（即是清化、壽春、萬籟地區）謁見黎世宗帝。Pedro Ordonez de Decevallos 神父在Đàng Ngoài住了近兩年，並給梅花公主（俗名占城公主）進行洗禮，她是黎世宗帝（1573-1579）的姐姐。一五九一年五月二十六日神父還為首批五十一位修女進行暫時祈禱。<sup>13</sup>可是，在同年的八月Pedro Ordonez de Decevallos神父和陪同的各位神父都被莫朝政權從Đàng Ngoài驅逐出去。

一五九六年西班牙神父（Diego Advarte和Aloizo Jimener）是道明會的神父。他們以法國和西非軍隊牧師的名義來給高棉王國救援，可是沒有結果。西班牙戰艦停泊在沱瀾港(Đà Nẵng)補充糧餉和淡水。Diego Advarte神父被准謁見當時的阮主。阮主周到地接待並約好讓他們可以在當地建設教堂和允許自由傳教，兩位神父停留在寒門(Cửa Hàn)一段時間。後來因誤會引起阮主的軍隊進攻西班牙戰艦。Diego Advarte神父受傷，幸能上船躲開，Aloizo Jimener神父則被阮軍俘虜，最後也跟商船回到菲律賓。<sup>14</sup>

十六世紀，西方（主要是葡萄牙和西班牙人）來到大越尋找市場，跟著的教士團趁此機會同行來大越北部、中部、中南部和那時南方的沿海地區進行考察。他們的主要目的是尋找可能傳教的地方。各個教派包括道明會或耶穌會都進行了帶有試驗性的探索。其中道明會教士在當時越南的各個地方傳教，從北部的沿海到中部和南部地區。但是，他們來傳教的地方如南定沿海，廣寧，廣南，沱瀾……等都成效不彰。只有在清化省、安場地區幾位神父能夠為一些人施洗禮，這些幾乎就是越南最早的天主教教徒。可以肯定至十六世紀末，儘管各教派的神父盡其所能，但是在大越國家還沒有奠定可以擴大傳教的基礎。主要原因在於傳教士並無學習越語，另方面則是他們宣教的經驗還不夠，所以傳教士不能深刻地了解當地人們的具體情況，以為傳教工作作出最好的貢獻。

<sup>13</sup> Đỗ Quang Chính, SJ. “Dòng Tên trong xã hội Đại Việt 1615-1773”, tr.10 -11, 記載：1591年Pedro Ordonez de Decevallos神父給梅花（或玉花）公主洗禮（越文）。

<sup>14</sup> Phạm Văn Sơn: “Quân dân Việt Nam chống Tây xâm (1847-1945)”, 頁22-24。



## （二）十七世紀在大越傳教的明顯結果

上面我們談到十六世紀在越南傳教的大概情況，至十七世紀，雖然那時還處於阮鄭內戰最激烈的期間，Đàng Ngoài和Đàng Trong的各個封建勢力統治者都對海外貿易實行擴大的政策。當時一名法國人Taboulet指出：「南方與北方的領主都很喜歡看見歐洲商人來貿易」。<sup>15</sup>阮主和鄭主多次向各國的東印公司的負責人與荷蘭、日本、英國等各國全權人遞交信封和贈品。在十七世紀初期從一六〇一到一六〇六年，南方的阮主（阮潢）主動跟日本德川家康來往書信。<sup>16</sup>在寄給駐臺灣的荷蘭副全權之信中，北方鄭主鄭柟寫道：「希望每年您的商船常來隨意貿易」。<sup>17</sup>在這個順利的基礎上，大越的經濟也有了新局面。全國的一系列貿易中心逐步形成。北方有升龍（河內），舖憲（興安），渭黃（南定）南方有富春（順化），會安（廣南），其中最發達的是舖憲，會安都成為跟外國商船活動的都市商港。商貿系統為十七世紀大越經濟帶來很大的幫助。從此，西方的傳教事業開始有初步進展。一六一五年一月六日一艘葡萄牙商船從澳門出發，十二天後於一六一五年一月十八號停泊於沱灤的寒門。隨著商船有一個由一位義大利神父（Francesco Buzomi）<sup>18</sup>帶頭的教士團，包括Diego Carvalho神父、日本神父Joseph Paul、葡萄牙神父Antonio Diaz。Francesco Buzomi是耶穌會教派當時最早來越南進行傳教的教士。這個教士團得到阮主Chúa Sãi (Nguyễn Phúc Nguyên 阮福源)熱情並周到地接待。後來阮主還允許讓教士團在寒門設立第一所教堂。一六一五年的聖誕節，教士團奉進聖禮，同時給十個人洗禮。接著他

<sup>15</sup> Taboulet, 《在東洋的法國工業》，Paris, 1955. Andrien Maisonneuve, T.I, p.15, 摘引：Cao Huy Thuần “Đạo Thiên chúa giáo và chủ nghĩa thực dân tại Việt Nam (1857-1914)”, (Luận án Tiến sĩ quốc gia, Đại học Paris, 越文譯本，頁53，史學院圖書館藏版)

<sup>16</sup> Phan Thanh Hải: Quan hệ giữa Việt Nam thế kỷ XVI-XVII nhìn từ 35 bức văn thư ngoại giao. 摘引：Đại học quốc gia Hà Nội-Trường Đại học khoa học xã hội và nhân văn: “Việt Nam trong hệ thống thương mại châu Á thế kỷ XVI-XVII” (VIETNAM in the commercial system of Asia 16th-17th centuries), Nxb.Thế giới, H, 2007, tr.22-233.

<sup>17</sup> Thành Thế Vĩ: “Ngoại thương Việt Nam từ thế kỷ 17, 18 và đầu 19”, H, Nxb.Sử học, Hà Nội, 1961, tr. 219 (越文)

<sup>18</sup> Francesco Buzomi (1575-1639) Napoli 耶穌會 (Dòng Tên) 2-9-1592, Goa 1609, Đàng Trong 1615-1639, 1-7-1639.

們來到Cacciam (Ke Chàm)，即是Thành Chiêm（占城），以及離Quảng Nam dinh（廣南營）西方約七公里的Hội An（會安）。這裡是Nguyễn Phúc Kỳ（阮福琦）鎮守官建立的公署。阮福琦是阮福源的長子。阮福琦被阮主封為廣南營的鎮守官，他佔據從海雲關到歸仁的區域。一六一四年在廣南營裡，鎮守官也允許各神父建立一所求願室稱名為Carianna和一間住所。也許這就是書籍記載在越南建設最早的一所天主教堂。在他們居留期間，有一個富貴的女士(Signora nobilissima)經常熱情幫助。這個女士願意讓各位神父進行洗禮。她的聖號稱為Giouanna，在自己的家裡，她還設立「較多奉教座」，每天都進行求願禮。<sup>19</sup>

每位教士都體認到當時是傳教的良機，所以，他們抓住機會在一六一五年很快成立Đàng Trong傳教會。這是越南第一個傳教組織。從此，天主教的耶穌會教派正式出現在越南。從一六一五年至一六二五年期間，有二十一位耶穌會教派傳教者被派來Đàng Trong，其中有十七位神父和四位大教士，主要是葡萄牙人，還有一位法國人，五位義大利人，五位日本人。在Đàng Trong傳教順利的情況下，教士團主張到Đàng Ngoài推動傳教事業。一六二六年Baldinotti神父和一位日本教士Juliana Piani開始到Đàng Ngoài了解那裡的具體情況，主要目的是開拓傳教活動地盤。當時Đàng Ngoài的鄭主Trịnh Tráng熱情接待教士團。在七個月的生活和考察後，Baldinotti神父回到Đàng Trong。他寫一篇報告詳細地描述Đàng Ngoài的美好情形。在幾個月後，一六二六年末，Đàng Ngoài處傳教會成立。一六二七年初，Alexandre de Rhodes 神父被派到Đàng Ngoài進行講道。一開始，Đàng Ngoài的傳教活動就獲得可觀的結果。在一份匯報裡，Alexandre de Rhodes神父寫道：「北方的鄭主允許我們（指教士團）在他的官署臨近建設教堂和住所。在進行本分的工作（傳教）時，我們得到（鄭主）的許多幫助」。<sup>20</sup>在三年傳教的期間，Alecandre de Rhodes神父和Pedro Marquez神父給

<sup>19</sup> Christoforo BORRI, "Relatione della nuova Missione delli PP.della Cmpagnia diGiesu,al Regno della Cocincina", Roma,1631, p.106-111。引自：Đỗ Quang Chính, SJ. "Dòng Tên trong xã hội Đại Việt 1615-1773", tr.21.

<sup>20</sup> Taboulet, 《在東洋的法國工業》，Paris,1955. Andrien Maisoneuve, T.I, p.15, 摘引：Cao Huy Thuần

Đàng Ngoài的天主教事業帶來很大的影響。根據Alexandre de Rhodes的記載，他曾為六千七百人進行洗禮。其中有幾位是鄭主王室的公主。<sup>21</sup>有一位鄭氏王妃聖號是Catarina，被洗禮後她使用韻文編撰跟天主教教理有關的三本書。<sup>22</sup>Làng Bồng Trung, huyện Vĩnh Lộc, Thanh Hóa（清化，永祿縣，逢中鄉）是Đàng Ngoài第一個傳教地區。這裡的首批教民是Alexandre de Rhodes神父在Đàng Ngoài講道期間（1627-1630）的最早信徒。<sup>23</sup>一六二七年，兩位神父暫時住在清化，安域處(An Vực, Thanh Hóa)兩個月，因為Alexandre de Rhodes會講越語，所以，他每天都跟本地人們見面，傳教。人們聽講道時，看見神父傳教、行禮的房間窄小，便自動帶來竹子，樹木等物料，加上葡萄牙商人的裝飾幫助，興建了教堂。教堂落成於一六二七年五月三日。這就是Đàng Ngoài最早的一所教堂。後來，Alexandre de Rhodes和Pedro Marquez曾來到京都升龍鄭主的王府進行傳教。他們得到當時的鄭主Trịnh Tráng接見，鄭主並聆聽Alexandre de Rhodes神父根據利瑪竇(Matteo Ricci)的通獻圖說著作演講天文學的知識。據記載：教士團從一六二七年七月二日正式來京都升龍，鄭主讓他們蓋房子在升龍的還劍湖旁邊。這很符合由Alexandre de Rhodes編寫的彙報內容。不到半年，升龍的信徒數量增多，據統計一六二八年初已有五百位教民。可是，此傳教事業並不能延續發展。一六二八年五月二十八日，鄭主派人在教士團住所門口樹立鄭主的令旨木牌。令旨的內容是禁止Alexandre de Rhodes和Pedro Marquez出外傳教，<sup>24</sup>從那天起，兩位神父被在家管束，不能跟教士團聯絡。

一六三〇年五月，Alexandre de Rhodes和Pedro Marquez兩位神父離開Đàng

---

“Đạo Thiên chúa giáo và chủ nghĩa thực dân tại Việt Nam (1857-1914)”, 頁53. 引自：Alexandre de Rhodes: *Lịch sử vương quốc Đàng Ngoài*, Bản dịch của Hồng Nhuệ, Ủy ban đoàn kết tôn giáo Tp.Hồ Chí Minh, 1994, tr.111, (越文)。

<sup>21</sup> Alexandre de Rhodes: “*Diveroyages et missions*”, Paris, 1953, 摘引：越南封建制度歷史，第3集，頁397，越文。

<sup>22</sup> Đỗ Quang Chính, SJ. “*Dòng Tên trong xã hội Đại Việt 1615-1773*”, tr. 43.

<sup>23</sup> 紅藍：在越南的天主教歷史“*Lịch sử Đạo Thiên chúa giáo ở Việt Nam*”摘引：《越南封建制度歷史》，第3集，頁397。

<sup>24</sup> Đỗ Quang Chính, SJ. “*Tàn mạn Giáo hội công giáo Việt Nam*”, tr. 44.

Ngoài。儘管不能久留在升龍，可是教士團給Đàng Ngoài傳教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據當時在升龍負責傳教事務的Antonio-Francisco Cardim(1596-1659)和Gaspar d'Amaral(1592-1646)神父的書籍記載，從一六三一～一六四〇在十年之內，平均每年都有八千名信徒接受洗禮。例如：一六三一年有5,727名信徒，一六三五年有8,176名信徒，一六三七年有9,707名信徒，一六四零年有10,507名信徒。特別的是，在一六三二年末，升龍已出現兩個信教小村：phố Hàng Bè 和 Ô Đống Mác。<sup>25</sup>

此時幾乎北方的每一個省會都有教堂，特別在山南處（主要寧平，南定，河南，太平等省份）的教堂更多。一六六三年在Đàng Ngoài總共有三百八十六所教堂，三十五萬教民。<sup>26</sup>教士團在Đàng Trong傳教，經過了五十年的努力（1615-1665），信教的教民卻只達到五萬。

藉由這樣的資料得以歸納出：十七世紀，Đàng Ngoài的傳教事業迅速發展。當時的神父在彙報裡經常提出Đàng Ngoài的傳教發展情況。一六三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升龍的Gaspar d'Amaral神父寄給在澳門的André Palmeiro神父一篇長達98頁的葡萄牙語彙報。Gaspar d'Amaral神父在彙報中回報在Đàng Ngoài傳教的良好結果，並稱讚為：「良民叫教民是互相疼愛之信教人。」<sup>27</sup>一六四七年十一月二日João Cabral教士(1598-1669)寫道：「本人以為在東方地區沒有能比Đàng Ngoài人更願意接受天主教的。這是一個純樸、良善、沒有惡毒習慣使人們難以實行傳播天主教的民族」。<sup>28</sup>

在十七世紀末，越南傳教事業越來越發達，尤其從一六六四年法國海外傳教會(MEP)成立後，這個傳教會跟著法國資本商貿勢力的擴大逐步的發展起來。法國海外傳教會在大越全國（包括北方和南方）的活動範圍與系統比葡萄

<sup>25</sup> Đỗ Quang Chính, SJ. "Dòng Tên trong xã hội Đại Việt 1615-1773", tr. 391.

<sup>26</sup> Đỗ Quang Chính, SJ. "Tần mạn Giáo hội công giáo Việt Nam", Nhà xuất bản Tôn giáo, Hà Nội, 2008, tr. 51, (越文)。

<sup>27</sup> 同前註，頁61，(越文)。

<sup>28</sup> 同前註，頁52，(越文)。

牙人的耶穌會教派和西班牙人的道明會和Phanxico教派更佔優勢。但十七世紀時，北方和南方的政權皆進行禁教政策。據書籍記載，一六一三年，南方上主阮福瀾(Nguyễn Phúc Lan)下令禁止西方人前來國內 (Đàng Trong)傳教。一六六三年北方鄭主鄭柞(Trịnh Tạc)驅趕教士並禁止國人(Đàng Ngoài)信奉天主教。一六六四年，南方的賢主(Chúa Hiền - 阮福瀾Nguyễn Phúc Tần)捕殺在沱瀾傳教的教士。一六九六年，鄭根(Trịnh Căn)下令焚毀全部天主教經典和各地教堂，並驅逐傳教士出境(Đàng Ngoài)。在嚴酷的禁教情況下，各個教士團都找到五花八門的辦法來避免南北兩方政權的殘酷政策。比如說，法國海外傳教會的教士易容為商人以便能在大越進行商貿，暗地裡則進行傳教活動。十七世紀末，一個名為Giffond的英國商人來舖憲(Phố Hiến)時曾說過：「法國人在這裡有住房，可是我們無法確知那些房子的用途是爲了商貿還是傳教」。<sup>29</sup>

### (三) 十八世紀傳教事業的發展過程

儘管十七世紀末十八世紀初，大越的北方南方各政權都繼續進行禁教政策的種種措施，但由於教士團的積極活動，因此在大越的傳教事業仍然持續擴張。然而，每個教士團都希望自己教派的傳教事業越來越發達，所以，各教派之間出現了互相爭奪影響的現象。這樣情形也引起大越天主教會的內部衝突。當時，在大越的教士來自葡萄牙、西班牙、義大利、法國、捷克、日本和中國等國，他們經常不斷彼此競爭。一七三九年，梵蒂岡羅馬教廷派來一位名為de la Baume的法國主教及三位教士到Đàng Trong解決各教派的紛爭，並於一七四零年，成功劃分各教派傳教的具體範圍：

(1) 允許耶穌會教派教士在北方各省，承天(Thừa Thiên)，廣南(Quảng Nam)半省，廣義(Quảng Ngãi)全省和農奈(Đông Nai)一部分進行傳教。

(2) 允許法國海外傳教會的教士在承天半省，廣南半省，歸仁(Quy Nhơn)，富安(Phước Yên)，慶和(Khánh Hòa)等全省的範圍內活動。

---

<sup>29</sup> Thành Thế Vĩ: “Ngoại thương Việt Nam từ thế kỷ 17,18 và đầu 19”.

(3)允許西班牙的方濟會(Francesco)農奈省餘留地區和高棉處(Xứ Cao Miên)進行傳教。<sup>30</sup>

這樣的劃分地區也進一步促使各教派加強傳教活動，以增加自己教派的教民，並使教派的影響更擴大。

十八世紀中期，葡萄牙、西班牙、法國等三個列強的政府都對耶穌會教派實行撤除的政策。一七五九年，葡萄牙政權下令驅逐耶穌會教派在國內和殖民地全部的教民。一七六四年，法國皇帝頒布完全廢除耶穌會教派的敕令。一七六七年西班牙皇帝亦下令把五千名耶穌會教派教民移到其他地區。一七七三年，羅馬教廷抵擋不住三個列強的意圖，克萊蒙十四世（Clement XIV）教皇不得已頒佈耶穌會教派解體命令，使得兩萬三千名耶穌會教派修士頓時無依。當時大越的Đàng Ngoài只留下道明會和法國海外傳教會活動，所以Đàng Ngoài的傳教事業便集中到法國海外傳教會的手中。在十八世紀，Đàng Ngoài政權繼續進行禁教政策，一七一二年，黎裕宗之世，鄭綱逮捕天主教徒，削其額髮，黥「學華郎道」四字於其面。一七五四年黎顯宗帝，鄭楹禁止國內Đàng Ngoài人民信教，對各教長和教徒格殺勿論。從此之後，禁教之令日嚴，可是傳教士卻不以國法畏懼，他們盡其所能地來傳播，使更多人入教。Labaritetts教士寄給一個朋友的信裡寫道：

目前信教的人們比任何時候更多得多……以前的教民被逮捕，不能忍受朝廷官軍的極刑後，逼不得已背教。現在那些人返歸天主教，新的教民日益增加。如果鄭主朝廷的太平延長一段時間，同時，教士來這裡增多，那麼Đàng Ngoài處的教會必定盛望發達。<sup>31</sup>

<sup>30</sup> Phạm Văn Sơn: “Quân dân Việt Nam chống Tây xâm (1847-1945)”, 頁22-24.

<sup>31</sup> Phạm Huy Đức: “Lịch sử đạo Thiên chúa ở Việt Nam từ sơ khởi đến 1946”, Đại Việt, Huế, Viện Sử học, Bản đánh máy (打字版, 史學院圖書館藏版)。

### 三、政權和傳教的衝突原因

#### （一）天主教對國人對傳統信仰的不重視

衆所周知，越南民族自古以來均以敬奉祖先為重，視祭祀神聖為天經地義的大事。況且各個封建朝代的禮法都有強調祭祀祖先的重要性。在十五世紀末期，有一部法典名為《黎朝刑律》或是《洪德律例》，是由黎聖宗帝（1460-1497）頒佈。這部黎朝法典總共有722條，其中第153條規定如下：「破壞祖先的神主看作破壞父母屍體，罔律定斬」。<sup>32</sup>

當天主教傳入之後，眼見許多人民順從外來的異教，完全放棄國內本有的禮俗。他們整天埋頭念天主教之經，不顧崇拜祖先；尤其從一七四二年起，羅馬教廷頒佈〈自從上主聖意〉（*Ex quo singulari*）憲制，不允許崇拜祖先及其有關事情。因為教廷認為崇拜祖先表現出人民的孝道是屬於迷信異端的。<sup>33</sup>從此，法國教士團完全禁止大越信徒崇拜祖先，在家不能設立崇拜祖先的奉祀座，並破壞神主牌。這個禁止使得天主教跟大越人民的敬奉祖先傳統產生了最大的衝突。在民間亦出現了很多詞語來排除天主教的影響如洋教、邪道、死道等。<sup>34</sup>

除此以外，天主教亦規定一夫一妻制，入教的人必須遵守規定。但這個條令也不符合於當時封建制度的實際生活，因此，十七世紀宣教團在南北方活動時，不少越南人不能信教，主要的原因即是他們現有多個妻妾，不忍心離開她們。一六四一年阮福榮(Nguyễn Phước Vinh)被任命為鎮邊營（福安）鎮守官，他喜歡天主教，而且還希望他鎮裡的人民一同入教。可是他個人也束手無策，不敢入教，因為他不肯離開各個小妾。一六二八年京都升龍發生被丈夫入教而被拋棄的側室們向Alexandre de Rhodes和Pedro Marquez兩位神父抱怨的事件。

<sup>32</sup> “Hồng Đức thiện chính thư”, Nguyễn Sĩ Giác biên dịch, Đại học viện Sài Gòn, Nam Hà ấn quán, 1959, tr. 65.

<sup>33</sup> Đỗ Quang Chính, SJ. “Tàn mạn Giáo hội công giáo Việt Nam”, tr.37.

<sup>34</sup> 同前註，頁39，（越文）。

她們散發謠言稱「華郎道是無仁道的」。鄭府官吏則認為為了減少民口，華郎道暗地傷害大越國家。一些太監官也感覺不安：如果國王、鄭主都信教，那便沒有宮妃，他們也就不能被重用。所以，被丈夫拋棄的那些婦女跟一些太監官申請鄭主禁止兩個神父繼續宣教。鄭主馬上同意，頒佈敕令曰：「教士們在我國的領土上正宣傳哪種教？你們規定一夫一妻，可是本人希望國內的臣民有多妻子，只有這樣才能產生許多奉事國家的子孫。從今天起，你們不能續宣教。即使誰不服從命令就被斬。」<sup>35</sup>

十七～十八世紀，許多人皈依天主教，朝廷視此教為邪道，有傷害國家自古之風化，降旨禁止國人再信天主教；且傳教士日增，以賓欺主。傳教士的目的是為了傳教讓上帝的福音傳遍大越，可是各國教會的目的完全不符合當時在越南各個封建統治勢力的實際情況。十七～十八世紀正是大越南北戰爭的時期，後來又分裂成Đàng Ngoài和Đàng Trong之局面；傳教士則在南北兩方創立醫院、開辦學校，既為了使人們能夠接近教會，也為教會培養人才。而傳教的一舉一動都產生了雙方面的後果：一方面是許多人崇拜西方，培植出一批努力為外國勢力服務的人；另一方面也在沉悶的封建思想文化統治的容器內，參入了科學技術甚至民主政治的新鮮空氣。傳教士是世界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傳播的橋梁，他們通過各種方式努力傳播西方先進的科學知識，溝通國內國外文化交流；也因此傳教之動機與效果之間不可能完全一致。這是世界近代時期的特點，不只是大越十七～十八世紀所獨有。此外，大越深受佛教和儒教的影響，另外，根本原因還有自古以來大越人民重視敬奉祖先的傳統。因此人們對天主教還懷抱疑惑，尚未完全信任。

### （三）教士團內部矛盾

教士團內部矛盾發展到頂點，引起各個教派互相爭奪教民與活動地盤，而這些衝突則直接影響到全國的安寧秩序。這個原因使當時大越的南北方封建政

---

<sup>35</sup> 同前註，頁43-44，（越文）。



權皆感到不安。所以，每個政權都實行禁止傳教的措施以便讓自己統治的地區得到安寧。從十七世紀中期，法國巴黎海外傳播教士和葡萄牙耶穌會教派在Đàng Trong發生衝突，情勢日益緊張，使得Đàng Trong的教會內部情況更加複雜。各教派教士都把具體間隙事情向羅馬教廷與巴黎海外傳教會報告。一六七六年，幾位耶穌會教派神父，教士與教派的神職人員向羅馬教皇遞交一份以漢喃字寫的奏書。其內容大概是Đàng Trong的耶穌會教派和法國教派的激烈衝突，希望教皇能夠儘快解決雙方教派的矛盾。奏書簽名的有103名包括在廣義府、牙庄府、吉營、廣平府的三位神父和一百個神職人員。在這個沉重分歧情況下，一六八〇年一月二十九日羅馬教廷的傳教部頒布一個敕令規定：要求將在Đàng Trong教會的兩位耶穌會教派神父（Giuseppe Candone和Bartolomeu d'Acosta）和在Đàng Ngoài教會的兩位耶穌會教派神父（Domenico Fuciti和Emmanuel Ferreyra）都召回羅馬。<sup>36</sup>但兩教派的矛盾還不能徹底的解決，十八世紀三零年代矛盾衝突更加劇烈，一七三七年九月三日，克里門十二世（Clemens XII）教皇必須派遣Elzéar François de la Baume. 主教來Đàng Trong的教會為羅馬教廷欽差官。在曲折的路程上，一七三九年四月主教才能達到Đàng Trong的教會，後來是他主持Đàng Trong四個教派的代表會議，並劃分了各教派的傳教活動地盤。

從十八世紀中期起，道明會和奧古斯丁教派的矛盾日益激烈，法國巴黎教派教士支持道明會活動。一七六二年，羅馬教廷派遣Rosalie神父從中國的一個教區來越南為羅馬教廷欽差官。他以教廷的代權下令奧古斯丁教派神父完全離開Đàng Ngoài。奧古斯丁教派教士不得已服從命令。從此在越南兩方奧古斯丁教派沒有教士活動。從一七〇一年奧古斯丁教派來Đàng Ngoài傳教開始至一七六二年結束，在60年期間總共有十三位義大利籍、五位越南籍以及幾位中國籍的奧古斯丁教士。<sup>37</sup>

---

<sup>36</sup> Đỗ Quang Chính, SJ. “Dòng Tên trong xã hội Đại Việt 1615-1773”, tr. 224-226.

<sup>37</sup> 同前註，頁429-437。

不只是內部的矛盾，天主教還跟本地的佛教發生了間隙。大家都曉得：在越南佛教有其重要地位，各個封建朝代都重視佛教，李朝和陳朝佛教曾成為國教。大多數越南人民都是佛教的信徒。所以在跟佛教關係上，天主教經常受到不利的結果。一六二七年Alexandre de Rhodes和Pedro Marquez神父來清化省永祿縣逢中鄉宣教時，在兩個月期間內他們使將近兩百人信教，因此與本地的佛教信徒發生了衝突。佛教信徒要求Alexandre de Rhodes和Pedro Marquez展開關於宗教問題的辯論。雖然安排了辯論，可是卻不能展開。佛教方面需要先講話並將辯論安排在兩位神父的住家進行。起初，天主教方面不允許，後來逼不得已讓步。<sup>38</sup>一六二八年，一些佛教信徒還向鄭主告狀說兩位神父催促從華郎道教民破毀佛像和神像。後來，兩位神父謁見鄭主說明事實，所以並沒有發生不好的事情。<sup>39</sup>

#### （四）教士團逐步參與政治，使得各個政權對傳教提高警惕

從十六世紀起至十八世紀，在傳教士來到大越南方和北方期間，他們得到兩方政權（莫朝-鄭主，後來是鄭主-阮主）的允許與禁止傳教，所以傳教事業時斷時續。可是總的來說宣教還是得到發展。

正如任何事物都有雙面性的作用，越南的傳教事業，對本土的人民造成的影響亦然，既是積極性也是消極性。各教派的教士跟商人都把先進的科學技術傳播到越南北南兩方，在一定的程度上為越南的經濟、社會推動了較好的進展。在十七～十八世紀，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和法國等各國的資本階級與各教派都積極幫助當時的北方和南方之封建勢力。各國資本階級的幫助是為促進跟北南兩方的貿易活動，使其更為發達順利，而最終目的還是為了能夠擴大資本市場並且獲得最多的本地土產如香料、茶葉、絲綢、手工業的產品等等。

<sup>38</sup> Đỗ Quang Chính, SJ. “Tàn mạn Giáo hội công giáo Việt Nam, tr. 133-134.

<sup>39</sup> 同前註，頁45-46。

各個教派的積極幫助還有別的目的，那就是讓自己的教派更能向外傳播。各教士還積極學越語，其目的是為了傳教，另一方面亦給越語帶來很好的改變。其中，對國語（越南語）的改變付出最大的功勞算是Francisco de Pinna(1585-1625) 和Alexandre de Rhodes等教士。他們與本地的知識分子進行改變國語以便使用。剛列出的幾點是天主教帶來的積極性作用。可是它亦有負面的作用，天主教對素為敬奉祖先，信奉儒教和佛教的越南國家而言，傷害了國體之風俗習慣，所以各封建政權與大多數人們都持著反對態度。這引起朝廷降旨嚴禁國人信奉天主教並制定法令，嚴懲違令者。在國家的嚴禁情況下，有不少教民也不敢繼續信教。從一六六四年起，Đàng Trong的政權更嚴厲地施行禁教措施，所以離開天主教的教民日益增多。據當時在會安和占城的Chevreuil神父的報告紀錄中言明，廣義府有四千教民，可是大多數都背教。<sup>40</sup>

從宗教轉到經濟領域，最終到政治，這就是天主教對於越南的傳教目的。早在十七世紀二〇年代，鄭主朝廷對天主教教士即抱持著疑惑的態度。雖然剛開始時鄭主熱情地接待傳教士，但最後還是禁止讓他們宣教，必須在家管束。因為鄭主聽到謠傳說傳教士跟在高平的殘餘莫氏聯繫，和南方的阮主勢力也有關係。如果莫氏與阮主同時起兵進攻鄭主時，在京都升龍的傳教士和教民會當作內應力量進行火攻王府。<sup>41</sup>

十七世紀末傳教（特別法國海外傳教會一六六四年成立後）的激烈活動更表現出是為殖民主義的侵略而服務。法國海外傳教會是由法國主教巴呂(François Pallu, 1626-1684)和朗柏爾(Pierre Lambert de la Motte, 1624-1679)發起建立的，會址設在巴黎。隸屬羅馬教廷傳教部並且受法國王室和貴族的大力資助。法國海外傳教會有任務：派遣年輕的教士赴東方國家傳教並培訓本地的神職人員。通過各種積極活動的方式，法國傳教士從十七世紀中期起在越南學習越語，又傳教，又蒐集當時越南的各方面情報，繪製地圖，以信件和報告等形

---

<sup>40</sup> Đỗ Quang Chính, SJ. “Đòng Tên trong xã hội Đại Việt 1615-1773”, tr. 237.

<sup>41</sup> Đỗ Quang Chính, SJ. “Đòng Tên trong xã hội Đại Việt 1615-1773”, tr. 144.

式向國內傳遞，為法國殖民政務服務。<sup>42</sup>Charles B. Maybon在他的作品曾指出：法國海外傳教會的歷史和法國在東洋的影響歷史有密切的關係。<sup>43</sup>

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法國傳教士越來越直接干涉到越南內部的政治領域。他們還為法國做侵略越南的先鋒軍。例如：St. Phalles, Pellerin等教士，其中具代表性的人物是Pigneau de Behaine, (1741-1799，百多祿)主教。在西山起義力量跟阮氏封建之對抗中，他(Adran)想方設法全力支持阮福映(Nguyễn Ánh)，阮福映後來成為越南阮王的第一個皇帝，年號嘉隆（Gia Long）在位十八年（1802-1819）。自一七八四年冬天，百多祿領阮福映皇子叫 Nguyễn Cảnh(阮景)及其舊臣范文仁，阮文廉等乘船西行，一七八七年春天始至法國，引見法王路易十六世。百多祿向法王遞進奏議寫道：「如果我們把這個國家（越南）佔領，則無論平時戰時都可以獲得最大的利益」，還指出「這些利益就是這個國家的天然資源」。<sup>44</sup>法王授權外務大臣莫穆里同百多祿主教以支持阮福映復國之事。經雙方討價還價，多次商討，直至同年冬天（1787年11月28號），終於締結了一七八七年〈越法凡爾賽條約〉。但是，所簽訂的條約後來因法國大革命爆發而不能實現。百多祿主教便自行招募人員，購置船隻和兵器彈藥於一七八九年六月攜回到越南南方支援阮映。一八〇二年，阮氏掌握越南的封建王位後，封給百多祿官爵和許多優待權利。甚至一些法國人如Chaigneau、Vannier還參加阮朝政權，這是阮朝初期要保持跟法國友好關係之措施。

#### 四、結語

從十六世紀中期到十八世紀末，西方教士團的傳教事業在越南南北方皆有強大的發展。開始時，跟著各國的商船來傳播在沿海地區的教士們沒收到效

<sup>42</sup> 梁志明主編：《殖民主義史》，頁138。

<sup>43</sup> Charles B. Maybon：「Những người châu Âu ở nước An Nam」，tr.24.


<sup>44</sup> 郭振鐸、張笑梅主編《越南通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頁533-534，頁612。

果，十八世紀末天主教已經進入從北方如涼山<sup>45</sup>到極南的河仙各個省份。甚至，他們還能傳教到生活在西北山區的芒族。兩個世紀多的傳教事業為天主教創造了在大越南北兩方較穩定的基礎。同時，還建立了傳播天主教的隊伍，其中包括西方和本地的教士，神父和神職人員的傳教機構。他們對大越人民的風俗習慣較熟悉，亦了解當時兩方政權的政治社會情況。教士隊伍想方設法來傳教，應用漢語，甚至還學習當時越語，以為深入人民生活而服務。Alexandre de Rhodes到大越六個月後，就能用比較成熟的越語來傳教。在十六到十八世紀全國的傳教發展過程，我們可以指出：雖然西方的傳教士從十六世紀開始在南北兩方進行宣教，可是及至十七世紀，傳教事業才有進展。<sup>46</sup>除此之外，藉由傳教的結果，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北方（Đàng Ngoài）的環境更適合西方的傳教。在同樣的一段時間裡，Đàng Ngoài傳教的範圍已經得以擴大，教民數量增長很快。一六二一年南方的信教數量僅有兩百人，不到半個世紀後教徒增加五百倍，一六六四年南方總共有十萬教民；北方的傳教事業則比南方進展更快。十七世紀中期，北方已有三十五萬教民，雖然十七世紀末期到十八世紀時南北方的封建勢力連續實行嚴厲禁教政策。據越南舊史記載：一六四三年，南方上王主阮福瀾下令禁止西方人前來國內（Đàng Trong）傳教；一六六三年，北方鄭主鄭柞重新下令驅趕傳教士並禁止國人信奉天主教；一六六四年南方的賢主阮福源捕殺在沱瀾宣教的教士；一六九六年鄭根下令全部焚毀天主教經典和各地教堂，並驅逐宣教士出境；一七一二年鄭綱逮捕天主教徒，削其額髮，黥字於其面；一七五四年九月鄭楹禁止國人（Đàng Ngoài）信教，對各教長和教徒格殺勿論；一七七三年十月份，鄭主又頒佈令旨：限定在兩月內從天主教民必須完全改變習俗（指放棄信教的各個禮儀），任何人違令或故意包庇都被正法，社

<sup>45</sup> 17世紀末期，在高平、涼山殘餘莫氏統治地區亦有300教民。引自：Đỗ Quang Chính, SJ. “Tàn mạn Giáo hội công giáo Việt Nam”, tr. 192.

<sup>46</sup> Nguyễn Hữu Tâm, “Bước đầu tìm hiểu sự thâm nhập và phát triển của đạo Thiên chúa ở Việt Nam qua biên niên sử (thế kỷ XVI- cuối XVIII)”. Tạp chí Nghiên cứu lịch sử, 1988, số 1-2, tr.20-23, (越文)

民告發事實的話，朝廷就給他的子孫免除徭役。<sup>47</sup>Charles B. Maybon在他的作品裡認定：北方信教比南方信教受到更大禁教壓力。一七零二年北方總共只存教民62,888人，一七一二年增加了三萬人信教，那年總共有95,673位教民。<sup>48</sup>但在一七三七年北方各教派的教民即增為二十五萬人，包括十二萬耶穌會教派教民，八萬法國海外傳教會教民，三萬聖會修士及兩千西班牙道明會教民。<sup>49</sup>

從十七世紀中期起至十八世紀末期，各教派的活動，尤其法國傳教士的所作所為無疑加重了各個封建朝代統治者和本地人民的猜疑和防範。這是引起十九世紀阮朝許多皇帝對傳教士經常進行嚴格甚至殘酷的禁教政策的主要原因；同時亦是信奉儒教和佛教的大多數越南人民和從天主教的教民發生了不少重大的衝突之根本原因。越南歷史上稱為良教衝突（良指無信教人，教指從天主教教民）。彼此怨恨，甚於仇敵。人們都以為自己的信仰較優，各不相讓，以致用權勢來鎮壓對方。皇帝和官吏因見常法不能禁，便使用極刑以正法天主教，殺害了無數無辜之人。

<sup>47</sup> “Khâm định Việt sử thông giám cương mục” Tập II, 欽定越史通鑑綱目，第二冊，Nxb.Giáo dục, Hà Nội, 1998, tr.300, 372, 400, 626-627, 708-709, (越文)。

<sup>48</sup> Đỗ Quang Chính, SJ. “Dòng Tên trong xã hội Đại Việt 1615-1773”, tr.393 (越文)

<sup>49</sup> Charles B. Maybon : “Những người châu Âu ở nước An Nam”, tr.78 , tr.174, (越文譯本)

## 參考書目

### 1. 越文專書

“Khâm định Việt sử thông giám cương mục”, Tập II, 欽定越史通鑑綱目, 第二冊, Nxb.Giáo dục, Hà Nội, 1998, (越文)

Cao Huy Thuần, “Đạo Thiên chúa giáo và chủ nghĩa thực dân tại Việt Nam (1857-1914)” (Luận án Tiến sĩ quốc gia, Đại học Paris, 越文譯本, 史學院圖書館藏版).

Charles B.MayBon : “ Những người châu Âu ở nước An Nam.” Nhà xuất bản Thế giới Hà Nội, 2006,(越文譯本)

Đại học quốc gia Hà Nội-Trường Đại học khoa học xã hội và nhân văn : “Việt Nam trong hệ thống thương mại châu Á thế kỷ XVI-XVII” (VIETNAM in the commercial system of Asia 16th-17th centuries), Nxb.Thế giới, H, 2007, tr.22-233.

Đỗ Quang Chính, SJ. “Dòng Tên trong xã hội Đại Việt 1615-1773”, Nhà xuất bản Tôn giáo, Hà Nội, 2008 (越文)

Đỗ Quang Chính, SJ. “Tản mạn Giáo hội công giáo Việt Nam”, Nhà xuất bản Tôn giáo, Hà Nội, 2008,(越文).

Phạm Huy Đức: “Lịch sử đạo Thiên chúa ở Việt Nam từ sơ khởi đến 1946” , Đại Việt, Huế, Viện Sử học, Bản đánh máy (打字版, 史學院圖書館藏版)

Phạm Văn Sơn (范文山): Quân dân Việt Nam chống Tây xâm ( 1847-1945 ), 軍史3 , 參謀總部, 西貢, 1971年版 (越文)

Phan Huy Lê- Đinh Xuân Lâm: “Lịch sử chế độ phong kiến Việt Nam, T.3” ( 越南封建制度歷史, 第3集, 河內, 1960 (越文)

Thành Thế Vỹ“Ngoại thương Việt Nam từ thế kỷ 17,18 và đầu 19”, H, Nxb.Sử học, Hà Nội, 1961. (越文)

Trần Trọng Kim: “Việt Nam sử lược”, Nhà xuất bản Văn hóa Thông tin, H, 1999,(越文).

Trương Hữu Quýnh-Đinh Xuân Lâm-Lê Mậu Hãn Chủ biên: “Đại cương lịch sử Việt

Nam toàn tập” , Nxb.Giáo dục, H, 2001.(越文)

## 2. 越文期刊論文

*Tạp chí Nghiên cứu lịch sử*, 1988, số 1-2, 歷史研究雜誌, 1988年第1-2期 (越文)

Nguyễn Hữu Tâm: “Bước đầu tìm hiểu sự thâm nhập và phát triển của đạo Thiên chúa ở Việt Nam qua biên niên sử (thế kỷ XVI- cuối XVIII)”. *Tạp chí Nghiên cứu lịch sử* (歷史研究雜誌), 1988, số 1-2, tr.20-23,(越文)

## 3. 中文專書

郭振鐸、張笑梅主編，《越南通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北京。

梁志明主編，《殖民主義史》，〈東南亞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北京。

阮榜中：《越南開國志傳》，漢喃研究院藏本，A.24/1-2。



## **Initiative research on the Christianity introduction and development in Vietnam during 16-18 centuries**

Nguyen Huu Tam\*

### **Abstract**

From the beginning of 15 century, European merchands have come to Vietnam for trading, while the christian missionaries also followed them. According to ancient materials, a missionary named IGNETIO in the First year of Nguyen Hoa during King Le Trang Tong's reign (1533) came by sealine to the district of Nam Chan (now Nam Truc) and some villages of the Giao Thuy district. From that time, missionaries continued their works in the centre of Vietnam like Thanh Hoa province, in the Southern Centre like Da Nang City – But until the end of 16 century, the Christianity preaching did not progress much, it must be in the 17 and at the end of 18 centuries this work appeared to develop strongly.

Despite the Christianity prohibition policies done in turn by the Le and Trinh authority in the North and that of Nguyen sovereigns in the South, the missionaries' works still gained certain successes due to their active agitations.

During the process of Christianity preaching, conflicts have appeared between missionaries with feudal authorities both in the North and in the South, this even led to missionary massacre. Its reason is that christianism did not respect the indigenous people's customs and habits as well as their belief of ancestors' worship. Otherwise the missionaries have done much deep

---

\* Director of Library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interventions to political domain of Vietnam interior authority while pushing up the religious propagation effects.

**Keywords** : 17 century, 18 century, Great Viet, Christianity propagation, National letter